

随思录

演戏和看戏

赵威

百年前山东农民闹义和拳，戏里的每位英雄豪杰、名相悍将、神仙鬼怪，几乎都被请出来，成为对抗洋枪洋炮的利器。那一幕幕闹剧、惨剧，是戏，非戏。像莫言《檀香刑》里为德国人修铁路的筑路工人，远远地看到戏班来了，等靠近了，才看出是身穿戏服的义和拳民。七八百人用十天内练成的“金刚不坏”之身，要与德国鬼子一较高低，悲剧就这样以喜剧的形式上演了。

中国的地方戏有数百种之多。中国人爱看戏，与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有莫大关系，过去人们被一亩三分地圈住了生活的全部，很多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农民没读过什么书，他们的世界观、历史知识主要从戏里得来，戏成了看世界的窗口。因此，戏成为义和团精神

力量的来源也就不足为怪了。有个叫史密斯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具有很强的爱演戏的本能”，而我们自己也常说“人生如戏”。人活一世，出将入相，粉墨登场，锣鼓喧天，真的像演戏。可是，人生岂能如戏？流年似水的日子靠谁来打底稿，编戏词？柴米油盐，精打细算，全靠自己。人这一辈子，没有彩排。

人生非戏，可就有人乐意演戏。红楼梦幻，谁解痴狂？戏里，贾雨村深谙为官之道，逢场作戏，假作真时真亦假，只不过为他人做嫁衣，成了阶下囚。戏外，装模作样演“雨村一子”的大有人在。贪官落马前高调反腐秀廉洁，甚至上午主持廉洁会议，下午就被纪委带走调查，一段慷慨激昂的讲话成了绝

唱，这一幕幕黑色幽默戏着实精彩；“裸官”的演技更是了得，把妻儿移民海外，他好专心演戏，想着在戏内大捞一把，到戏外挥霍一番，天下哪有如此美事？一纸国际红色通缉令破了他们的美梦；还有那些为官一方“刮地皮”的蠢虫，成为臭名昭著的官场过客。这些极力扮演“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公仆，穿梭在戏里戏外，红脸白脸间，游刃有余，演砸的却是自己的人生。

有乐意演戏的，就有乐意看戏的。下级演给上级看，一级一级往上演，那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注水数据都是道具。看戏的明知他人强作欢颜，演戏给他看，可就是喜欢看。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尊严，在其面前演戏的人越多、演得越好，说明自己越有地位、越有面子。一旦遇到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他们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角色，演技决不会差。像和珅那样从一个三等侍卫一路攀升到权倾朝野的重臣，不能不说演技了得。和珅之贪，乾隆帝心知肚明，他的下场，乾隆帝也已料到。他们一个善于揣测上意，演得好；一个玩兴浓，喜欢看。戏里戏外，演戏看戏，二人玩得亦乐乎。

看戏的不怕台高。麻木的看客，从日俄战争时起就被鲁迅先生批得体无完肤。可是，看客的心态早已成了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非一朝一夕养成，也非一朝一夕能去之。至今，围观、起哄的看客心态仍深深地嵌在我们的街头文化中。回想荒唐年代，“大跃进”“放卫星”，全民演戏，全民看戏；还有那大批判、大批斗，抓住了看客的心理——免费看戏，真是一出好戏！想想那场面，竟跟枪毙阿Q一样壮观，人山人海，观者如潮。阿Q在如潮的人群中意外发

现了吴妈，于是，演员的表演欲望被激发，他悔恨自己没唱几句戏，思来想去，竟无师自通地来了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嚎叫。

而矮子看戏，又是另一种心态了。《朱子语录》云：“矮人看戏，见前面人笑，他也笑，他虽眼不曾见，想必是好笑，便随他笑。”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表现出来的却是毫无原则性。“枪打出头鸟”被这种人奉为圭臬，他们决不会做“木秀于林、人高于众”的蠢事。出头的入被打倒了，他就会沾沾自喜，或许还忍不住吹捧一下自己，“看我多有先见之明，幸亏没跟他走”；出头的入要是得到多数人认可了，献媚往往是这种看客的第一反应，大家都说好，想必不会错了，且要比别人更多美言。这样，即便错了，也没关系，法不责众嘛。

说法

为什么在《环保税法(草案)》中，碳污染、光污染没有被纳入征税范围？我认为，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如果把二氧化碳认定为污染物，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对于目前的中国发展而言是很不利的。我赞同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法的范围，但现在的时机并不成熟，以后纳入更合适。目前，全球大约有十几个国家将二氧化碳排放纳入征税范围，多数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没有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税。中国现阶段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难以避免，这也是需要付出的发展代价。总之，从长远来看，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征税，但何时征还是要根据国情需要作出考量。

——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

我一直有一个口号：我要搞“参与文学”。我始终认为，文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参与现实生活、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如果文学躲在一边，只面对一朵小花孤芳自赏，固然也能写出不错的甚至优秀的作品，但这必然导致文学被时代潮流所抛弃，被人民群众所疏离。这些年文学之所以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学没有参与时代、没有参与社会、没有回应人民的关切。

——作家陆天明

行政监察覆盖面太窄，仅限于政府职能部门、各级政府以及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无法实现与党内监督“人员”的有效重合和衔接，造成监督面的“一宽一窄”。修改《行政监察法》是给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重构或顶层设计提供一个路径。借这个机会修改监察法，把《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然后在监督的对象上实行全覆盖，在监督的手段上不断地丰富。在监督的机构和职能上，实现有效的监督、监察资源的力量整合，这样就既达到了修改法律的目的，又达到了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目的，所以这是“一石二鸟”。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当大家意见不一致时，争论就会发生。这种争论，往往是一场用户看不过去的PK，成为“PK文化”。但“PK文化”是一种平等的声音，通过讨论、PK来决定那种情况对用户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种竞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做减法，做减法不是说减掉那些错的事情，那些谁都会。做减法最难的还是要减掉那些对的事情，这是最难的。

——腾讯副总裁林松涛

漫画角



惊梦

刘志永 绘

老话新聊

要好儿孙必读书

桂晓燕

如果有人问，宁波人最擅长什么？答曰：一是会读书，二是会做生意。恭喜你答对了！适逢第二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2016宁波书香·宁波读书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读书的话题。

宁波人历来重视读书。有几句宁波老话说得好：“要好儿孙必读书。”“木勿凿勿通，人勿学勿懂。”“秀才勿怕衣破，只怕肚里没货。”古往今来，我们宁波出过许多文化名人，也就是出类拔萃的读书人，如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等。到了现代，宁波籍两院院士的数量稳居全国城市前列，宁波因此被称为“院士之乡”。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也是阿拉宁波人。

许多老宁波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在街头巷尾的“小书摊”看“小书”的快乐。这可是当时许多小学生最重要的课外阅读方式哦。所谓“小书”，就是连环画，就地看一分钱两本，带回家看一分钱一本(第二天要还)。那架子上插满花花绿绿小书的小书摊，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小学生们，但凡口袋里有几分钱的，一放学就直

接“杀奔”小书摊而去！

与宁波浓厚的读书风气相联系，宁波的藏书文化也闻名全国。据考证，宁波历代有事迹可考的藏书家有154位，有名可稽的藏书楼40余处，天一阁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中国民间藏书文化的象征。当年乾隆皇帝为专贮《四库全书》，特兴建文溯阁、文源阁等七座皇家藏书楼，就以宁波范氏天一阁的格局为蓝本。

宁波人爱书、读书、藏书的传统，在今天得到了传承和发扬。2009年，宁波确定城市形象的主题口号为“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书一港，体现了宁波的特色和优势。打造书香之城，是城市整体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新世纪新阶段，阅读的最大特点是全民阅读。阿拉宁波老话与此不谋而合，对各类人都强调读书的重要。少年要读书，“筑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中年要读书，“工作靠恒心，读书靠专心。”老年也要读书，“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到。”

新世纪新阶段阅读的又一特点是全媒体阅读。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纸质出版物也就是书报杂志等，一直是人类文化成果传播的主要载体；而

今天我们尤其要看到，当代社会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文化成果的传播带来了一场重大的革命，改变了亿万人的阅读生活。今天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对象早就远远不止是纸质出版物。由于电脑阅读、手机阅读的海量资源和方便快捷，越来越多的读者很少甚至不再看书看报。

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一个度。如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无数受众尤其是青少年，都成了“手机控”、“低头族”。有句话说，有的人因为时时刻刻“机不可失”“见机行事”，手指已经和手机长在了一起！

尽管电脑阅读、手机阅读容易产生“浅阅读”和“碎片阅读”不能一概贬低；尽管电脑阅读、手机阅读也可以有“深阅读”；然而，我们仍然要强调传统形态出版物尤其是书籍的不可替代性。在提倡“深阅读”和“系统阅读”的意义上，书籍无疑有其特殊的优势。所以王蒙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书还是要捧着读的”。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作人生的一种境界和追求，它囊括了我们获取真理的途径，凸显了“知行合一”的民族智慧。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畅读天地间的大书。

社科书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制度和技术的创新



《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
庄巨忠 保罗·范登堡
黄益平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

本书由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编写，从“中等收入转型挑战”“改革与再平衡”“宏观经济和结构变化”“社会、人口和环境挑战”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详尽论述，同时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的政策选项，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做了预测。

朱晨凯

去年11月，《人民日报》刊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中提出，必须加快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过去的这一年里，社会各界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和讨论，也有了诸多理论成果。本期推荐的《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可以说是这一年来关于“中等收入”话题的理论合集，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等主导编写，全书分四大部分十九章，每章看似论述各自独立的话题，有独立的引言、论点、论据和结论，但都围绕着“中等收入转型挑战和其实现路径”这一核心话题，回答了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中国如何跨越过去等问题。

庄巨忠在书中指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就中国当下而言，虽不能说“落入陷阱”，但确实确实“站在陷阱边缘”，需要直面挑战。书中引用了很多国外“跨不过去”的例子。近百年来，全球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走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有一百多个，但从中等收入阶段如愿走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却屈指可数，仅仅13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公认的落入中等收入

陷阱者的代表，其国内盛行的“民粹主义情愫”和“福利赶超路径”选择，实际上是导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面对“风险重重”的陷阱，中国应该怎么跨？《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中举了一些“跨过去”的例子。这些“跨过去”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是通过后发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不仅使本国经济腾飞，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

除了依靠制度和技术的两大支撑基点，也要对两者的相互关系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分不同阶段及时进行调整和升级。《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中指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黑箱”远未充分打开，两者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在“赶超实现阶段”，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而实现引领。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庄巨忠认为可以从七个方面来应对：调整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减少对外的依赖，增加内需；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可持续的财政状况；积极推进城市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通过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深化资源价格改革。黄益平则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同时入手：放宽增长目标的区间，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强调，在直面“中等收入陷阱”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基本上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亟待完成攻坚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通过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



《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贾康 苏京春 著
中信出版社
2016.8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遇到的问题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复杂情况，本书具体分析了“悲观派”“乐观派”和“谨慎派”的不同观点，论述了我国应怎样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吸取失败国家的教训，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



《美国创新的挑战》
梁宇睿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7

“新兴经济环境下的知识创新和创新的全球化”论坛在中国香港举办，会后若干学者在自己演讲的基础上，以英文形式写成本书的各个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当前中国创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对于探索中国创新面临的挑战及难题、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数字

79.4岁

——数据显示，目前女性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4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0.1/10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8.1%和10.7%，这些指标总体上处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妇女儿童受教育权利得到较好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普通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中女生比例分别达到52.4%和49.7%。

下降了52.3%

——监测数据显示，从2013年“大气十条”实施以来，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2015年重污染天数占全年比值4.1%，这个数字比2013年下降了52.3%，其中京津冀2015年比2013年下降了51.7%。

每天超过4万户

——国家工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增幅连续3年超过10%，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市场主体更是超过4万户，新登记企业1.4万户，比改革前的2013年每天0.69万户，增长1倍多。